



# 张岱年

自传

通往爱智之门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张岱年自传 通往爱智之门

张岱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往爱智之门/张岱年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

(大家自述史系列)

ISBN 978-7-301-18212-3

I. ①通… II. ①张… III. ①张岱年(1909~2004)—自传 IV. ①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7553 号

**书 名:** 通往爱智之门

**著作责任者:** 张岱年 著

**策划组稿:** 王炜烨

**责任编辑:** 王炜烨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212-3/K · 073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169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 目 录

## 第一部

003 / 前言

014 / 身世：家庭和幼年生活

021 / 求学十年：通往爱智之门

034 / 而立之前：学术思想初步形成

>>>

073 / 八年沉潜：专务深思，穷究天人

092 / 物换星移：从《不惑集》到“知天命”

108 / 一场噩梦：被贻误的 20 年

117 / 新的时期：学术生涯的第二次青春

144 / 望九之年：无厌无倦，壮心不已

## 第二部

173 / 我的家庭和幼年时期

176 / 在京求学

180 / 30 年代至 40 年代的探索(上)

198 / 30 年代至 40 年代的探索(下)

214 /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经历

226 / 80 年代的思考

247 / 进入 90 年代

261 / 平生思想述要

271 / 往事杂忆

第一部



## 前 言

我生于 1909 年 5 月 23 日,如今已是年近九旬,21 世纪也即将到来,可以说,我一生大致经历了 20 世纪的各个时期。回首前尘,不胜感慨;瞻望未来,我对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中国文化的昌盛,充满希望。

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几次思想活跃、富于创造的高潮,首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繁盛;次则魏晋时期,玄学勃兴,思辨风行;再次是北宋时代,理学隆起,中国固有传统得以发扬;明清之际,几位大思想家同时涌现,蔚为壮观。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侵袭,国人同仇敌忾,图谋振兴,思想上逐渐突破旧规范的束缚,以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达致巅峰;迨至 30 年代,国难日亟,全国人民急起救亡,于是马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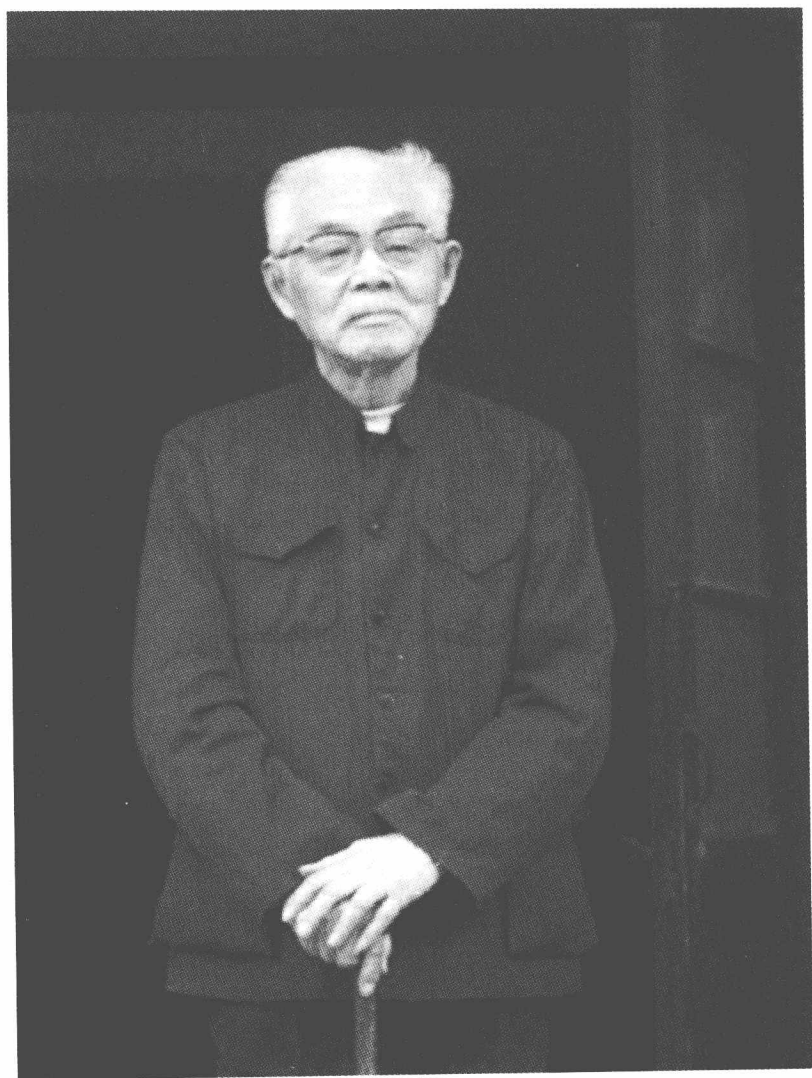
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学术界亦出现了一些独辟蹊径的思想家,可谓又一次百家争鸣。我从30年代初开始加入学术论坛,讨论哲学与文化问题,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了。

我自20岁起,兼治中西哲学,既诵习中国古代哲学典籍,也阅读英文哲学著作,而颇好深沉之思,不自量力,拟穷究天人之故。年未“而立”即撰著《中国哲学大纲》,此后又进而研思哲学之究竟,著《天人五论》(即《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对于宇宙人生,独抒所见。40岁以后(1949年后),因教学工作专业化,遂专心研究中国哲学史,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过程进行科学的探索。对于哲学理论问题存而不论,唯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坚信不疑。光阴荏苒,倏忽四十余年,近年又复对于哲学理论问题感兴趣。昔年章太炎(炳麟)先生在所著《菡汉微言》中自述思想变迁之迹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我的治学经历,可以说是始则由论入史,终乃由史转论。平生学术宗旨,略有可言。

自30年代迄今,我的学术活动约分三个方面:一为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为哲学理论问题的探索,三为文化建设问题的研讨。

(一)关于中国哲学史,我所特别注重的有三项:一是彰显其唯物论传统,二是阐发其辩证法思想,三是弘扬其人本精神。同时,关于中国哲学范畴与价值观的考察亦由我首倡,这些都是前人所未注意的,我初步提出了关于中国哲学范畴的理论分析与价值学说的诠释。





张岱年于1985年讲《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曾提到“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后来才知道梁漱溟早有此论，可谓不谋而合。

我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唯物主义的传统，每一时代都有宣扬唯物论的哲学家，唯其所采取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汉代王充“疾虚妄”、南朝范缜论“神灭”，是最显著者。北宋张载提出“太虚即气”、“凡象皆气”，反驳“有生于无”及“天地幻化”的观点，开创了近古时代的唯物论。明清两代的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戴震，都继承发展了张载的“气化学说”，实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优秀传统。

中国的辩证思维尤为丰富、深湛，孔子讲“辨惑”，道家讲“反衍”，《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都是极其深邃的思想，张载、王夫之更阐发了“两一”理论。

中国古代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尤为值得注意。“以人为本”，即反对“以神为本”，可称为人本主义观点。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智矣。”以人事为重，而不祈求上帝的保佑，从而确定了中国文化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的传统。中国的一般群众虽然信仰原始多神教和佛教，但知识分子的宗教意识非常淡薄，这主要归功于孔子学说的影响。（我于1985年讲《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曾提到“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后来才知道前辈梁漱溟先生久有此论，可谓不谋而合，愧未能早读梁老著作。1986年在一次座谈会上，梁先生发言说，儒学不是宗教，儒家一不谈生死，二不讲鬼神，所以决不是宗教。我完全同意梁老的这一观点。）我特别推崇孟子的“良贵”学说，孟子宣扬人的独立人格，特别重视人的人格尊严，对于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健康发展，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二）关于哲学理论问题，我始终坚持唯物主义。早在30年代，我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为辩证唯物论的真理光辉

所吸引,同时对于现代英国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亦颇赞赏,又认为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亦有可以继承的内容,于是试图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及中国哲学的思想精粹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管窥之见。

40年代致思所得的臆说有四:物统事理,一本多级,与群为一,兼和为上。我以为,物的存在都是过程,就过程中的变化而言,谓之“事”;就其变化中的恒常而言,谓之“理”。凡物都是事事相续而具有一定之理的过程,可以说是“物统事理”。

物有不同层次,最基本的是无生命的物质,无生命的物质是基本粒子构成的。物质变化而产生了有生命的物质,有生命的物质演化而产生了有心知的有生命物质,物质是一本,生命与心知是较高的层级所具有的特性,是谓“一本多级”。

“与群为一”本是为了修正“与天为一”思想而提出的。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程颢宣扬“与万物为一体”,我以为这些都未免失之玄远,只是精神上的自我陶醉。最高的道德境界应是爱国家、爱人民、公而忘私,与社会、国家合为一体,是谓“与群为一”。“与群为一”即是集体主义。

孔子以“中庸”为至德,受到后儒的称赞,程颐对于“中庸”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庸”观念含有两层意思,一肯定事物的变化超过一定限度就要转向反面,二要求坚持这个限度以免转向反面。在日常情况下,“中庸”是必要的。在社会变革的时代,“中庸”可能成为前进的阻力。我以为“中庸”不如“兼和”,“兼”是兼容歧异,“和”是保持一定的平衡。在一定条件之下,可以容许“过之”。我

认为,矛盾是变化的根源,而和谐是物体存在的基础。“和实生物”,新事物的产生实由于一定的和谐,故曰“兼和为上”。

50年代,我研读了以前未读过的马、恩所著《自然辩证法》、《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列宁的《哲学笔记》,对于辩证唯物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但此后我对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西方哲学则无缘做深入研究,不为无憾。我虽已是耄耋之年,但壮心未已,仍愿对于一些哲学理论问题进行探索。

(三)关于文化问题,我始终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论”,亦不赞同国粹主义,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的见解。所谓“综合”,有两层含义:一是中西文化之综合,即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之下综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与近代西方的文化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吸取、学习西方的科学成就及其与科学发展有密切联系的哲学思想。二是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包括儒、墨、道、法各家精粹思想的综合以及宋元明清以来理学与反理学思想的综合。诸子百家各有所长,儒学定于一尊的时代久已过去了。尤其应该将墨家的贡献继承下来。文化的综合创新有一个理论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少年时期,我对于民族危机感受极深,痛感国耻的严重,于是萌发了爱国之心,唤起了爱国主义的激情。我深知救国必须有知,于是确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热诚。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事实上,我也知道仅靠学术是不能救国的。中国的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经过艰苦

卓绝的斗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解决了民族危亡的问题。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直到今天，我仍信持辩证唯物主义。学无止境，我决心在学术园地中继续前进！

回忆往昔，在中学读书时受教于林励儒先生、汪伯烈(震)先生。30年代以后，有幸时常与冯芝生(友兰)先生、金龙荪(岳霖)先生、熊子真(十力)先生晤谈，受益良多。我赞同冯先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些见解；我努力学习金先生的分析方法；熊先生为文笔力雄健，我读后深受启发。我远慕孔、墨、孟、庄的宏卓深湛，对外钦敬西方哲学家的笃实缜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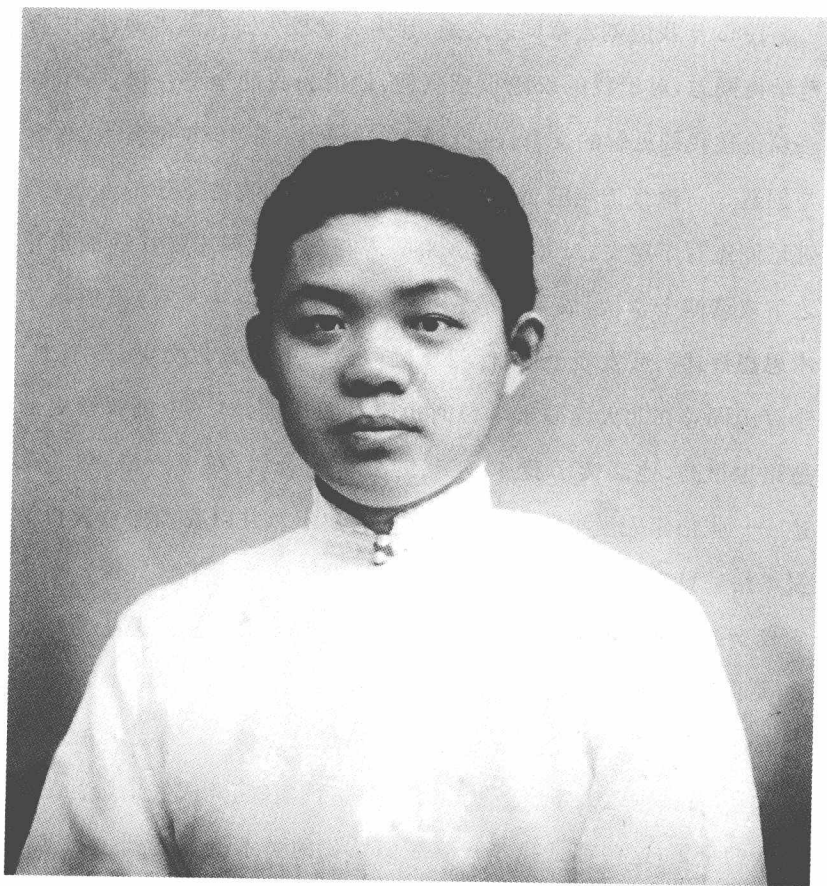
近年来，有几位及门学友对于我的哲学思想颇感兴趣，写了一些评述文章，可说是我的知音。古语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何况这些同志都近在咫尺，我的感慰之情是难以言表的。首先应提到的是程宜山同志。宜山同志1978年到北大做硕士研究生，在我的指导之下研读中国哲学史，毕业后潜心研究，造诣更深，1989年写有《综合创造，自成一家——论张岱年先生早期哲学思想》。宜山同志学有根底，对于我的思想了解甚深。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建议撰写一本《中华的智慧》，我担任主编，即约请宜山同志参加撰写，他写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参加撰写的还有方立天、刘笑敢、陈来同志)。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同志邀我写一本系统论述中国文化的书，我亦请宜山执笔，他依据我的文化观点，展开论述，写成《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他的文笔较我丰茂，此书出版之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友人方立天同志与方克立同志都很赞许。宜山同志工作极其勤奋，竟因劳致疾，于1991年4月不幸病逝，这是我十分悲痛的！



许多学者及他的学生对张岱年的学术思想很感兴趣,写了论述文章。这里张岱年与他的中外学生们在一起。

1986年我应刘宏章同志之邀，到中央党校为研究班讲课，座中有范学德同志，对于我的议论很感兴趣，他借去我的全部存稿，写了许多篇论述我的见解的文章，进行深入的分析评述，1988年辑为《综合与创造——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一书，是关于我的思想的专著，刘鄂培同志写了序文。1981年，陈来同志与刘笑敢同志都在我的指导之下攻读博士学位，成果丰硕。陈来同志于1985年写有《张岱年学术思想评述》，后发表于《时代与思潮（三）·中西文化交汇》一书中。李存山同志在北大读硕士学位时也听过我讲课，对于中国哲学史的造诣也很高，他阅读了我40年代的哲学论著后，写了一篇《并非陈迹——张岱年先生早期哲学思想的今日启示》，并以我和加拿大哲学家本格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做了比较，对于我的见解了解甚深。中央党校李振霞同志编著《当代中国十哲》，以我为其中之一，邀王中江同志写了关于我的章节。王中江也是我指导的博士生之一。1989年，刘鄂培、钱耕森同志建议编选我的文集，现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六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我的自选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我的全集，这些都是我非常感激的。我的学术论著受到这么多同志的注意，我感到非常欣慰。我所提出的一些见解得到这么多同志的赞同，我确实感到吾道不孤。

记得少小时，我就谨遵先慈遗命，做好人而求上进，60年来我始终不敢怠忽，未染任何不良嗜习，平生甚至鲜有思逸休歇的时候，有几年学术研究工作被迫停顿，亦尽力于劳动锻炼或资料整理。如今我虽年近九旬，然脑力未衰，仍愿继续努力进行探索。学而不倦，乐以忘忧，诚不知老之已至矣！



张岱年曾回忆：“在初中读书时，开始有志于学，而我的学术生命可说始于1931年，时年22岁。”这年张岱年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后被《古史辨》（第四册）收录。图为1931年时的张岱年。



廿年前,我曾改易陈子昂诗句,曰:“前既见古人,后亦睹来者(今之后学才俊,皆来者也)。念天地之长久,吾欣然而微笑。”以是作为我对自己学术人生的画像和对于新世纪的祝语吧。是为序。

1998年8月22日于北京大学中关园